



胡真主任当时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停止学生大串联，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流脑疫情的蔓延。**

的大规模流动有直接关系。您亲身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您看到的情景是怎样的？

曾光：1966年，我当时正在河北医学院（今河北医科大学）上学，亲身参与了大学生大串联。学生们挤上绿皮火车，车厢里上下三层都是人。不是你们想像的上下三层卧铺床位，是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都是人。人上车了就很难下来，下来了也上不去。

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只要有流脑传染源，那么就非常容易造成人群中的大规模传染。

1967年疫情是中国有记载的最严重的一次流脑疫情，总共有304万人感染，死亡超过164000人。尽管处于“文革”中，但当时中国的疾控体系还在运行，因此统计数字是绝对准确的。

《新民周刊》：面对这么严重的疫情，当时大家采取什么防控措施呢？

曾光：引起流脑的脑膜炎奈瑟菌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当时卫生部门牵头做很多的宣传。比如张贴宣传画，指导老百姓服用磺胺类药物、板蓝根、醋熏等预防流脑，其中服用磺胺类药物为首选的预防方法，但这些预防措施实际上效果不佳。

《新民周刊》：这次疫情后来是怎么平息的呢？

曾光：控制1967年的流脑疫情，有两位流行病学前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当时的主任胡真和副主任胡绪敬。他们分别负责流脑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研究，他们在流脑上所作出的成绩获得了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胡真主任当时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停止学生大串联，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流脑疫情的蔓延。

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提出这个建议是有风险的，但我们的老科学家坚持自己的判断，后来这个建议被采纳，全国的学生串联被叫停。

《新民周刊》：重提这段历史，您觉得有什么值得我们总结的教训和经验？

曾光：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我是国家卫健委新冠病毒防治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到武汉考察后，我提出高度警惕春运传播新冠的可能性，建议这个时候武汉人尽量不要外出。

提出防控建议时，我们就借鉴了1967年流脑疫情蔓延的教训。

我们将这个科学判断提出来，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做了说明。

疫苗接种最终控制了疫情

《新民周刊》：您见过流脑病人吗？

2020年9月25日，国新办举行新冠病毒疫苗工作进展情况吹风会，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介绍新冠病毒疫苗工作进展情况（右一）

